

B

BLUE BOOK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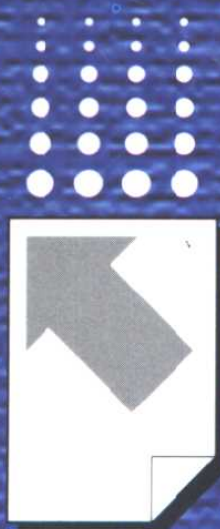
EUROPE

欧洲  
蓝皮  
书

2001~2002 年

欧洲发展报告

欧元与欧洲的改革



主 编/郑秉文

副主编/沈雁南 刘 绯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欧洲蓝皮书

# 2001~2002 年 欧洲发展报告

---

欧元与欧洲的改革

主 编 / 郑秉文

副主编 / 沈雁南 刘 绯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1~2002 年欧洲发展报告 欧元与欧洲的改革/郑秉文  
主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  
(欧洲蓝皮书)  
ISBN 7-80149-637-X

I. 2… II. 郑… III. 欧洲-研究报告-2001~2002  
IV. D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0773 号

·欧洲蓝皮书·

2001~2002 年欧洲发展报告

欧元与欧洲的改革



主 编: 郑秉文  
副 主 编: 沈雁南 刘 绯  
责任编辑: 严 波  
责任校对: 刘玉霞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9.75

字 数: 272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637-X/F·196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 编 郑秉文

副 主 编 沈雁南 刘 绯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 绯 沈雁南 顾俊礼 周 弘

裘元伦

作 者 (按文章先后顺序)

提 要 沈雁南

提要与目录英文翻译 吴倩岚

主 题 篇 裘元伦

综 合 篇 闫小冰 薛彦平 刘立群 潘琪昌

专 题 篇 吴 弦 杨伟国 王子先 李文锋

程卫东

国别与地区 张健雄 陈志瑞 马胜利 顾俊礼

罗红波 田德利 张 敏 王 鹤

陈 新 庞大鹏

资 料 篇 钱小平

欧洲大事记 蔡雅杰

本报告由欧洲联盟委员会资助出版，欧洲联盟委员会及任何代表欧洲联盟的工作人员均不对本报告之信息负责。

This publication is fund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Neithe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nor any person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Commissio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use that may be made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book.

---

中国欧洲学会 (CAES)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IESCASS)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CESCASS)

# 提 要

当前，欧洲正处在重大转折和变革的关键时期。欧洲不仅在告别着旧世纪，迎接新世纪，而且也在告别着冷战后时代，创造新时代。在 21 世纪第一个年份里，西欧一些执政的中左翼政党，为兑现竞选中的改革承诺，力排众议，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变革举措，一时改革之风盛行；在欧洲的东端，普京新政已经在俄罗斯初见成效，经济好转，政治与社会亦渐稳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方面，2000 年年底欧盟政府间会议的闭幕及其产生的《尼斯条约》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了新的前景<sup>①</sup>，同时有关欧洲一体化未来体制模式的争论重又升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伴随着这场讨论的是欧元正式流通和欧盟东扩等实际问题的日益迫近，欧盟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做出种种改革与建树，其成功与否将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产生重大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9·11 事件”映衬出了欧洲国家外交的个性。透过欧洲各国领导人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同情和对恐怖主义行径的谴责，以及随后欧美在反恐行动中的合作等行动，我们看到了欧洲的国际地位正得到提升。美国“9·11 事件”后欧洲内外关系的调整集中展示了欧洲正在走出冷战后的过渡时期。欧洲几大国的外交动向格外引人注目。

---

<sup>①</sup> 本书付印之际，传来欧盟莱肯首脑会议闭幕的消息；会议决定成立以德斯坦等人  
为首的欧盟制宪筹备委员会，此举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我们将在下年度的报告  
中对此次会议予以详析。

2001~2002年度，在西欧政治舞台上，以社会民主党为主流的中左翼政党继续在谱写着西欧政治的主旋律。尽管近两年来它们的整体实力有所下降，但与中右翼政党的状况相比较，仍然处在优势地位，不仅得以继续执政，且有的还进入了更为稳定的发展时期。目前，欧洲社会主义者党派联盟连续执政的政治目标已部分得到实现，并通过连续执政而使中左翼政治力量获得更多的政治经验。

值得关注的是，在欧洲联合的大背景下，欧洲各国的中左翼政党的合作与协调正在不断得到加强，同时，国内各不同中左翼政党之间的联合也在加强。这些都是中左翼政党成功的重要因素。

但是从根本上说，西欧中左翼的成功在于它们选择了一条改革之路。正是通过推进改革，树立了改革者的形象，从而提高了它们在公众中的政治期盼值和支持度。在那些长期由中右翼或中右偏右的党派执政的国家，中左翼得以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竞选中提出了改革的承诺，并在上台后尽力推行了改革。中左翼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地位不仅使西欧政治成了“社民党政治”，造成了一个“社民党时期”，而且在西欧开创了改革时代。

在西欧，有的国家正在进行着大幅度的改革，如英、德、法三国。在英国，工党政府废除了几百年来的上院世袭制；德国的红绿联盟政府大力实施多方面的改革，被视为“推进了战后最重大改革”的一届政府；法国政府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特别是选举制度的改革。其他国家的中左翼执政党也普遍在进行着改革。可以说，能否有效地推进变革并树立改革者形象，决定着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能否获得公众的支持；而中左翼党派在选举或民意测验中失分（如葡萄牙社会党政府、挪威工党政府）也盖因其无力推进有效的改革。

然而，上台容易执政难，靠改革的旗号呼风唤雨是一回事，让改革风调雨顺则是另一回事。虽然执政党们都在竭力促进改革，但都有不同程度的难度。法国分析家认为，经济成果不再是赢得选举的决定性因素；舆论已不把经济繁荣看做当局的功劳。

左派政府目前的社会经济改革对它的政治传统有很大动摇作用，并可能造成新的不稳定。同时，左翼政党的社会基础已发生了变化；政治文化发生重组。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传统意义的工人减少，左派的社会目标也离工人阶级越来越远。在社会价值观方面，个人主义思潮日渐突出。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人的发展、解放和福利，而人的集体特性，如种族、国籍、社会地位等的重要性则明显削弱。价值观的变化正在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分野。

另外，政党政策的趋同现象也在发展，这一点在德国最为明显，议院各政党都在向“中间”调整。在欧洲，政党之间的竞选似乎更像“技巧”的竞争，而不是“主义”的斗争。各政党为了竞选胜利，不惜“剽窃”对手的“思想”来加以改装兜售；如果找到对手的“丑闻”当然再好不过了。继德国发生“献金丑闻”（科尔为此下台，基民/基社盟至今尚未翻过身来）后，2000年9月，法国又传出了“梅里事件”的丑闻。它不仅把左右两派都牵扯了进去，而且矛头直指总统希拉克，从而对“左右共治”的局面和2002年的大选产生深远影响。

## 二

改革不仅表现在一国数国，也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改革在欧洲是全方位的发展趋势。欧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未来欧洲的命运在于其联合与改革的成功与否。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特别是在最近三、五年间，欧洲层面上的改革与其一体化进程同样有着很快的发展。

欧洲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与机制的改革，二是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在制度与机制的改革方面主要涉及欧盟的机构与机制改革、成员国对欧盟的制度和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必须做出的日益广泛而深刻的适应性调整，直至将欧盟的立法真正转变为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同时，各成员国亟须加速国内改革步伐，以扭转欧洲经济与社会缺乏朝气和活力的惰性局面。

2000年12月在法国尼斯结束的欧盟政府间会议令人关注。会议的直接动因固然是集中讨论机构体制改革以适应东扩需要。但欧共体创建以后所逐步建立起来的一套组织机构，随着一体化的发展所暴露出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进行调整，欧盟



将难以适应形势。此次欧盟政府间会议，尽管困难重重，但终就最为棘手的机构改革问题，做出了较为现实的安排。尽管最终产生的《尼斯条约》远未达到欧洲联邦主义者所企望的高度，但其对欧盟实行东扩，乃至对欧洲未来政治体制安排的意义和影响，都不应低估。

欧洲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主要在三个领域展开，即大力发展“新经济”，积极推进企业重组（包括加强扶持中小企业），以及致力于发展经济多样化。虽然欧洲在“新经济”的发展中落后于美国，且迄今为止尚未在整个欧洲形成高潮，但欧洲具备追赶美国的条件，欧盟及其成员国都在致力于发展“新经济”，争取在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上，实现让欧盟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地区组织，从而使欧盟达到经济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目标。企业重组首先表现在大企业的并购浪潮上，其次是企业内部的调整，核心是制定新的管理战略。第三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创立、生存和发展。致力于发展经济多样化，是欧洲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卢森堡和德国鲁尔地区是突出的例子。卢森堡大公国成功地克服了一度辉煌的钢铁业的衰落所带来的困难，实现了经济的多样化，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高度发达的经济，并且仍在迅猛发展。

制度性改革是欧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主要涉及到五个方面，即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调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调整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以及“股东文化”的兴起。

在调整国家与市场关系方面，欧洲国家的普遍选择是“多些市场，少些国家”和“改进国家，改进市场”，通过“自由化”（打破垄断、开放市场、放松限制、促进竞争）、私有化和调整国家作用。在调整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方面，首先是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某些限制；其次，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第三是减税。近来欧洲特别是欧元区国家似乎正在出现一股减税浪潮。在调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方面主要涉及的是社会福利国家问题。欧洲社会福利制度在本意上内含着人道主义、社会和平与社会公平等积极因素。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内外环境的变化，社会福利费用支出已使欧洲国家不堪重负。改革已是势在必行。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保持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理念和核心部

分；尽力杜绝滥用；节减某些项目；让社区、家庭和个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只援助在努力奋斗的“自助者”和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在世界市场和欧洲内部竞争日趋加剧的环境中，欧洲国家昔日一切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正在日益遭到削弱。过去为实现社会平等和互助而统一调控不同行业 and 不同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的能力正在下降。工会组织面临严重生存危机，使雇主与雇员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分配关系明显朝着有利于资方的方向倾斜，实现普遍的、规范的规则的机会减少，结果是在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中出现愈来愈多的“自愿性”、“灵活性”和多样化。

近几年来，“股东文化”正在欧洲兴起，它将给欧洲带来意义深远的影响。首先，它可能会开始改变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深受社会民主主义历史传统影响的西欧政治，政治家们要比以前较多地考虑股东的利益，而不再总是迎合包括工会在内的“压力集团”的要求。其次，政府将减少对企业的管束。企业管理者将日益抵制政府的管束压力，理由是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对股东负责。最后，欧洲公司企业的筹资渠道将逐渐发生转变。

欧洲正在通过改革试图建立一种既非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又非旧欧洲模式的资本主义。

从总体上看，2001年欧洲经济改革不仅步伐在加快，而且更加坚实有力。但经济改革的进程并不均衡：一是欧盟层面的改革不尽如人意，在有些方面还滞后于某些成员国改革，二是各成员国改革在深度和广度上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在改革的大势之下，2001年的欧洲经济形势并不容乐观，还可能对改革带来负面影响。本年度欧洲经济的特点，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二是通货膨胀率先升后降，三是就业增长速度放慢，四是利率调整更加频繁，五是财政状况让人担忧，六是商业信心指数一路下滑，七是企业大幅度裁员。

2001年是欧元启动的第三年，也是欧元进入正式流通前的最后一年。欧元发行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随着欧洲经济改革措施的实施和欧元进入流通，有可能对未来一年的欧洲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目前，国际货币市场对欧元的信心已达到2001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 三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通过电视，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几乎是在第一时间里目睹了纽约世贸大楼顷刻间灰飞烟灭的惨烈场面。恐怖事件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了极其强烈的震撼，并迅速猛烈地冲击了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亦难幸免。

美国“9·11 事件”对欧洲的冲击主要反映在安全、经济、政治三个大的方面。

在安全方面，当世贸大楼轰然倒塌，夷为平地的时候，人们旧有的安全概念也随之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在近年来饱受二恶英、疯牛病、口蹄疫惊扰的欧洲人看来，对安全问题必须要有重新思考和认识。身边的安全已不仅仅是食品卫生或环境污染那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少数人的种族主义暴行；血与火的灾难不再是周边国家或世界其他地方的某一场战争或某一场民族冲突，仅是一种间接的威胁，而是完全可能发生在身边的像美国“9·11 事件”那样切切实实的灾难。美国“9·11 事件”以后，欧洲各国一方面纷纷表示了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同情和对恐怖袭击的谴责，并立即参与国际反恐行动，在国际社会中铲除恐怖主义的势力。同时，另一方面也在国内加强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

如果说安全概念的变化更多的具有心理因素，其影响所及也许是间接的、长时段的，那么经济方面的冲击则是更直接、更实在的。经济损失中首当其冲的是欧洲的民航业、旅游业等，客流减小、市场萎缩，陷入困境。

在政治方面，美国“9·11 事件”使布什政府上台以来欧美之间的争论得以降温，并增强了双方共同整合欧洲及周边地区的动力。

自 2001 年年初布什就任总统后，欧盟与美国的摩擦接二连三地出现，暴露出双方局部战略利益的分歧。美国日趋严重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在诸如“京都议定书”、经贸问题以及对某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上（如对朝鲜、俄罗斯、伊拉克及对华政策等）的表现，引起欧洲的不满与抵制，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欧美在美



国战略导弹防御计划（NMD）上的矛盾。

这些矛盾与冲突，一方面表现出，在冷战后过渡期间美国“单边主义”外交兴起的同时，欧洲外交的个性得到了凸现，民族国家利益超出了国家集团的利益；另一方面从西欧政治的角度分析，还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变化正在成为影响美欧关系的重要因素。当前正值西欧中左翼党派向原有的价值回归之际，而美国新政府则被西欧中左翼视为“最保守的一届政府”，一个偏左，一个偏右，必然进一步拉大两者间的思想距离。以社民党为主的西欧中左翼党派，在近 10 年的紧密合作中形成了一股较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在自身力量上升的情况下，西欧中左翼也有意识地对国际政治天平上的失衡进行矫正。

但从根本上来看，欧盟与美国毕竟有着共同的全球战略利益。美国“9·11 事件”后，美国已然意识到欧洲仍然是其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最可靠的盟国，特别是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必须要有欧洲国家，包括俄罗斯的支持。因此 2001 年 9 月以后，欧美出现了理所当然的缓解和接近；俄美关系也借此得到了弥合。美国“9·11 事件”再次给予欧盟和美国显示其在涉及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同仇敌忾、团结一致的机会。透过美国“9·11 事件”前前后后的外交波澜，我们看到了欧洲国际地位的提升，也看到了欧洲各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初见成效，冷战后的过渡阶段似乎正在告一段落。

近几年来，中国与欧盟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良好。中欧贸易额不断扩大，欧盟在华直接投资继续增长，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在稳步发展。目前欧盟已是我第一大技术供给方和第二大实际外资来源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机电产品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2001 年是欧元过渡期的最后一年；2002 年 1 月 1 日，欧元现钞问世，正式投入流通。欧盟作为中国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其欧元的顺利运行有利于减少货币结算的风险和成本，促进中欧贸易的发展。随着我国与欧元区成员经贸合作领域的拓宽，我国对欧元的需求也必然越来越大。总的来看，欧元正式流通有助于推动和促进我国与欧盟经贸合作的发展，但也有可能带来一定风险。

与过去几年相比，2001 年是中欧关系发展非常顺利的一年。

当前，中欧关系和亚欧关系都处在深层的结构调整状态之中。作为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两大国际战略力量，中国与欧盟关系的整合以及 21 世纪双边全方位战略合作关系的构建，必将影响到中欧关系的未来走向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同样，作为亚欧两大洲之间的一种新型多边合作关系，亚欧关系的发展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亚欧两大洲在新世纪里的合作方兴未艾、潜力巨大。

# Precise

Europe is at a turning point and a crucial moment of reform. It has not only left the old century and entered into a new one, but also finished the post Cold War period and created a new era.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21-century, the central and left wing parties of west Europe came to power in most of government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mmitments made during the election campaigns, these parties undertook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s in spite of various kinds of resistance. In east Europe, the new policy adopted by the Putin government promoted the recovery of economy and the stabilization of society. The European Council held a summit by the end of 2000 in Nice. The Nice Treaty opened new prospects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ontentions on future institutional model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raised increasing concern. In the mean time, Europe is fac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Euro in the form of cash and the eastward enlargement of EU. Corresponding reforms had been adopted by EU in order to adjust to the developments. The success of the reforms will impos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9·11 terrorism attack” mirror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eign policies adopted by European countries. Immediately after the attack, European countries expressed their sympathy to the U. S. A. and condemnation of the attack,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trike against terrorism. Europe’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d as a result increased. The adjustment that Europe



had made in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after the “9·11 terrorism attack” proved that Europe had finished its transformation period after the Cold War. The foreign policies adopted by some big European countries deserved particular attentions.

## I

During 2000 ~ 2001, central and left parties-mainly in the form of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continued to dominate the political arena of west Europe. It was a matter of fact that the power of central and left wing parties was weakened than before. However, compared with central and right wing parties, the central and left wing parties maintained advantageous positions and acquired higher credibility for future development. Currently, the alliance of European socialist parties has partly realized its political aim, i. e. to be reelected as ruling parties. As a result, the political experience acquired by the central and left wing parties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mong European central and left wing parties were strengthened with the deepening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alition of central and left wing parties within individual European countries was consolidated. These facts constituted the important elements for the success of European central and left wing parties.

However,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success of European central and left wing parties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reform initiated and implemented by the parties. These parties established their images as reformers and increased their public political expectation by promoting the reforms. The fact that central and left wing partie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political affairs produced “social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created a “social democratic era” and a time for reform in west Europe.

Various forms of reform were undertaken in European countries. In U. K. , the labor government abandoned the hundreds of years long Hereditary Membership System of the House of Lords. In Germany, the red-green alliance government was regarded as the government that had implemented the most important reform since the World War II. The French government adopted the reform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particular the reform of election system. Reforms were carried out in many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a party to undertake a reform determined the popular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former. Some European central and left wing parties failed to complete effective reforms, (e.g. Portuguese socialist government and Norwegian labor government). As a result, these parties lost in the elections and public referendums.

However, the ruling central and left wing parties experienced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s. According to French analysts, economic figures no longer acted as decisive factors to succeed in elections. The media no longer attributed economic prosperity to ruling parties as a sole success of the latter.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 implemented by left wing parties had deeply impacted traditional political behaviors of parties and might cause new uncertainty to the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social basis of left wing parties had transformed and political culture had changed. With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iminish of the size of traditional working class, the social targets of left wing parties became less linked with working class. With respect to social values, people highlighte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freedom and welfare but cared less for ethnic groups, nationality and social posi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values would impact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theories.

Furthermore, policies adopted by parties began to converge. In Germany,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adjusted their policies to the “middle”. In Europe, the competi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focused more on technical terms than on theoretical terms. In order to succeed in elec-

tions, political parties stole competitor's thoughts and were keen to find scandals of the latter. Following the "bribery scandal" in Germany, "Mairie Event" was exposed in France in September 2000. The event had not only involved both left and right wing parties of France, but was also directly linked with the French President Chirac. The event would as a result impact the co-governance of left and right wing parties in France and the general election in 2002.

## II

Reform not only took place in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neither was it implemented in the aspect of politics only. Reform had become an overall trend of Europe. Europe entered into a new era. The success of reform would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Europe. Since the end of 1970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5 years, both reforms at the level of Europe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had proceeded rapidly.

European reforms were mainly undertaken in two aspects: systematic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economic structural reforms.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involved firstly,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European Union (EU); secondly, vis-à-vis the laws and policies adopted by EU, the broad and deep adjustments member states of EU had to make in order to transform EU law into national law. In the meantime, member states of EU had to speed up their domestic reform in order to invigorate European economy.

The Nice Summit held by European Council concluded in December 2001 aroused general attention. The Summit was intended to initiate EU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order to prepare for future eastward enlargement. However, the institutions of EU based on that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 experienced series of problems with the deepening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t constituted another reason for the summit. The Nice Summit produced relatively realistic arrangements for the planned institutional reform. Although the Nice